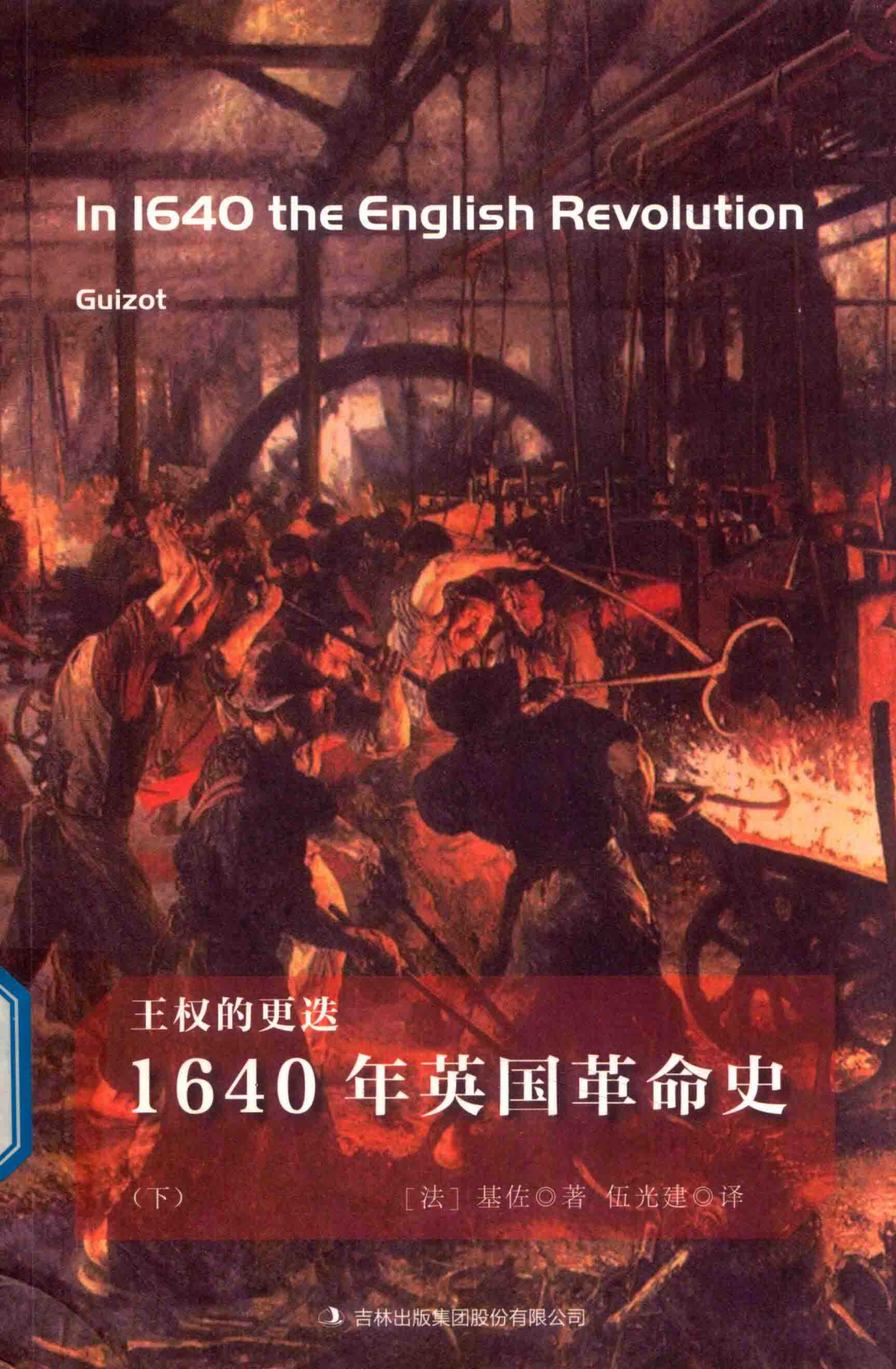




In 1640 the English Revolution

Guizot

王权的更迭

1640 年英国革命史

(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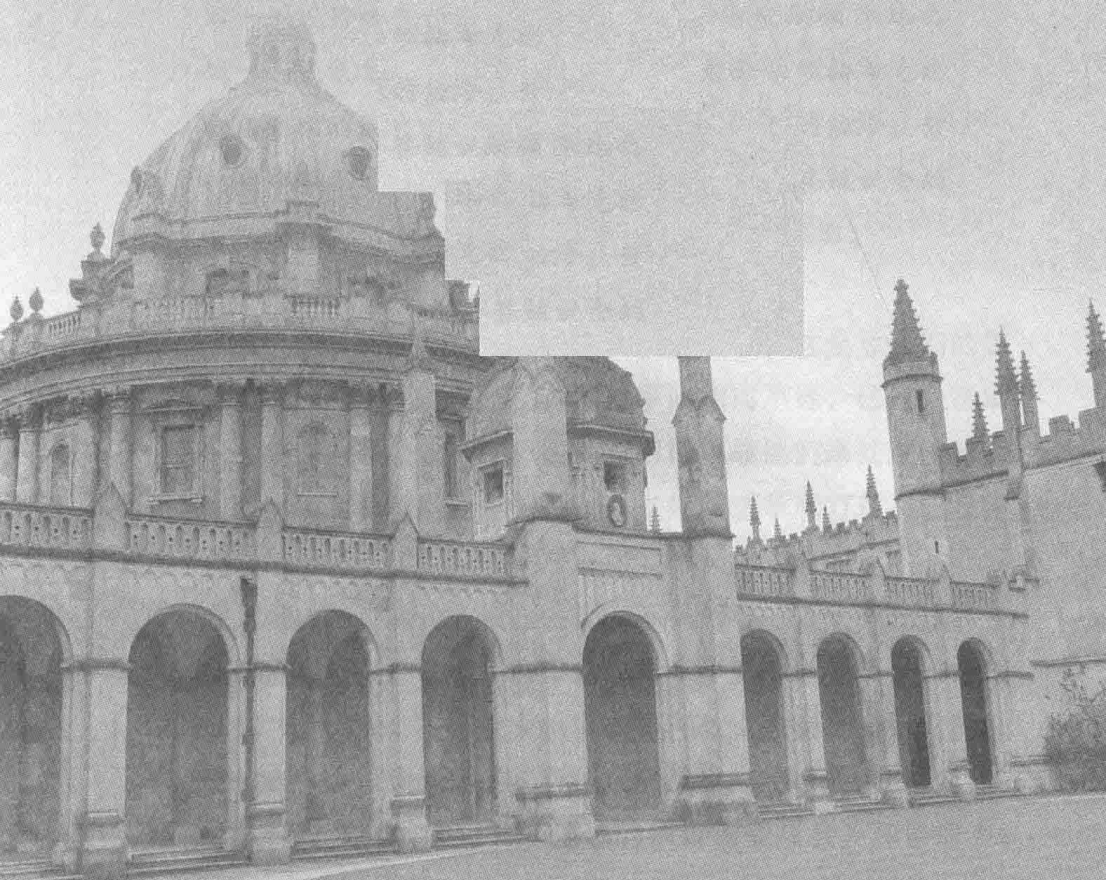
[法] 基佐◎著 伍光建◎译

王权的更迭

1640 年英国革命史

(下)

[法] 基佐◎著 伍光建◎译



吉林出版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图书在版编目 (C I P) 数据

1640 年英国革命史 / (法) 基佐著 ; 伍光建译 . —
长春 : 吉林出版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 2017.11

(王权的更迭)

ISBN 978-7-5581-3413-5

I . ① 1… II . ①基… ②伍… III . ①英国资产阶级革
命—历史 IV . ① K561.41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7) 第 262509 号

1640 年英国革命史

著 者 [法] 基佐

译 者 伍光建

策划编辑 杜贞霞

责任编辑 王 平 史俊南

封面设计 老 刀

开 本 650mm×960mm 1/16

字 数 318 千字

印 张 26.5

版 次 2018 年 4 月第 1 版

印 次 2018 年 4 月第 1 次印刷

出 版 吉林出版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电 话 总编办 : 010-63109269

发行部 : 010-69584388

印 刷 天津兴湘印务有限公司

ISBN 978-7-5581-3413-5

定价 : 68.00 元 (全二册)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第五卷 1643 至 1645 年

双方的情况以及独立派的兴起——在牛津的行宫的行动——国王与爱尔兰人订立停战条约——议会在牛津——皮姆之死——1644 年之战——马尔斯顿泽地之战——埃塞克斯在康沃尔之败——长老会派领袖与克伦威尔之间的误会——尝试谈判——自我克制的法令。劳德受审和死亡——在阿克斯布里奇议和——整顿议会的军队——费尔法克斯受任将军——埃塞克斯辞职。

长老会会员的高兴达到极点：议会得救了，这全亏他们的领袖；他们的仇敌闷不吭声了；苏格兰军队相离不远，已应允帮助他们，他们是决不会食言的。因此今后将单靠他们来处理改革和战争之事。而且由他们随意处理，或是继续改革和打仗，或是停止一切。

在议会内外，在伦敦或在各郡，不久就有一阵宗教狂热和专制风气弥漫于各处。教士大会奉命起草一个管理教会事务的计划（10 月 12 日），四个苏格兰大臣奉命协同教士大会准备该党的一个宏伟规划——以便两国的礼拜仪式取得统一（10 月 20 日）。各郡所派的调查在职教士行为及他们的宗旨的委员会，加倍努力，

几乎有二千名牧师从所在职位上被驱逐，有许多人被控告，说他们是再浸礼派，或布朗派或独立派等等。他们得知送他们进牢的人就是不久以前与他们一同咒骂他们公敌的那些人。在伦敦市里，无论什么人，凡是拒绝在盟约上面签名的都不能当市政会的会员，连选举市政参议员时亦无权投票（12月20日投票）。自从打仗以来，议会曾命令各剧院关门，却没有从宗教立场上宣布过反对演剧。仅仅说，国家多难，人民应该多悔罪及祈祷，不宜将时光糟蹋在娱乐上（9月2日）。全国素来在星期日或节假日所玩的各项民间游乐全被禁止了，无论是自古以来就有的，或显然没有什么害处的，全在严禁之列，一种也不能幸免。冬去春来，自古竖起的五朔节花柱^①（作为人们欢乐的象征）全被拔掉了，不许再立新的，即使是小孩子们犯了这条严令，也要重罚其父母，以赎子女娱乐之罪。大主教劳德已经被监三年，无人过问，现在忽然传他到上议院受审，且受命答复下议院所控的诸多条款（11月13日）。狂热把仇恨和报复看做自己的天职。

对于战争也表现出了同样的狂热。本市的长老会派，因为在新近几次战役中立下了很大的功劳，就洋洋自得，不再谈和平了。有许多富裕市民出钱为士兵供给军装，还有自愿亲身入伍的。其中有一个名叫罗兰·威尔逊的，是一所很大的企业的既定继承人，拥有每年有二千镑收入的不动产，投到埃塞克斯麾下，带领一营自己招募及自己装备的队伍。甚至有几个领袖人物，如霍利斯、格林·梅纳德等人，向来对于谈和是很表友好的，现在却对市政会大声疾呼，鼓动他们作出最大努力。这个党从来没有像这个时候这样活力充沛，也从来没像这个时候这样大权在握。

但是这一派离垮台不远了。从一开始，这一党就担任宗教与政治的双重改革，但不是用相同的观点办这两方面的事。对于宗

^① 用花或彩带装饰的柱子，少男少女绕柱舞蹈游戏。——译者

教方面，这个党的信仰是热诚的，信条是简单的、坚决的、连贯的。长老会的体制，是由平等的牧师们管理宗教事务，共同开会议事。从这个体制看它的本身，它不是人定的，不是软性而是硬性的，不是人们可以任意修改以适应时势与环境的。它自认是唯一合法的宗教体制，是奉神旨而存在的，简直可说是根据基督的法律而存在的。这一党坚持要不惜任何代价争取它的无限制的胜利，认为自己所进行的是一场神圣的及必不可少的革命。其政治观点却与此相反，不管该政党的语言和行为是怎样的严峻，它的思想却是空洞无物，它的动机也是稳健的，并未被系统的信仰和真正的革命激情所推动。它虽然出兵抗拒国王，但心里却爱独裁；虽然要君权受其节制，但还是尊重国王的特权；虽然只相信众议员，却并不怨恨或藐视贵族；既服从维新的需要，又服从古老的习惯；对于其自身并没有什么明确的看法，无论其宗旨或其行为的后果均是如此。它认为它只企求合法的改革，如此便于愿已足。

长老会派就这样交替地被傲慢或动摇、狂热或温和的截然相反的思想所支配，它从来不曾从自己队伍中涌现过一个领袖，而只是一贯地从和该党意气相投的情绪中得到鼓舞。它跟随着政治改革家的足迹，这些改革家是民族运动的最早的阐明者，又是他们的真正代表。这样的同盟是自然的而且也是必要的。何谓自然？因为这两党有共同的目的，都是只求改革，而并不要求取消政府。何谓必要？因为政治改革家们拥有大权，而且以他们在阶级、地位、财富和知识上的优势，维持这个权力。在这些优势方面，即使是最热心的长老会会员也决不会想到同他们争高低。大多数的政治改革家们虽然接受长老会的支持，甚至在必要时，还大作让步以收买他们的支持，但对于教会事务，却不能与他们的意见及观点取得一致。政治改革家们一向是满足于一个温和折中的主教制，其功能限于按照法律来管理教会事务。因此他们是十

分勉强地支持长老会的，而私下里则尽力阻止他们的发展。这么一来，主张宗教革命的那一党的精力就被一些领袖们所抑制，这些领袖们既非该党所能抛弃，亦非该党所愿抛弃的。只有在政治改革问题上，两党的联盟才是完全而又是出于至诚的。换言之，在这样的事业目标上，领袖们和该党既没有什么奔放不羁的激情需要满足，亦没有什么一成不变的绝对原则必须遵循。

到 1643 年的年底，政治改革——至少是合法的政治改革——已经大功告成了。弊端已不复存在，他们以为必须改革的法律也已经改革，又曾竭尽所能改造了许多制度；凡是以保护古老权利为己任的人及拒奉国教的长老会员们所共同企求的，以及能够协力造成的，都完全办到了。但是宗教革命却几乎还未开始，而政治改革则正在动荡不定，缺少保障，大有变作一场革命之势。现在到了这样的时刻：迄今为止的占统治地位党派的内部缺点以及它们在结构上、纲领上以及在计划上的矛盾重重不可避免地暴露出来了。这一党每天不得不走在不同的道路上，并尝试进行各种不适当的努力。它想在教会中寻求的，却在政府中予以拒绝，它所持的立场与所发表的言论，往往先后矛盾；一会儿宣扬民主派的原则与感情，以反对主教制；一会儿又宣扬专制独裁制及贵族制的教义和影响，以反对正在上升的共和主义。同是这一群人，一只手在推倒，另一只手在破坏——今天提倡新事物，明天又咒骂维新派；有时敢作敢为，有时又缩手缩脚；有时做叛逆，有时又实行专制；有时以自由的名义去迫害主教们，有时又以权力的名义去制裁独立派。简单地说，这一派一面无日不大喊大叫反对专制和反叛，同时却自命有天生的造反和专断的权利，人们看到这一切都不得不叹为奇事。

这个时候这一派觉得已被他们的几个领袖抛弃、否定或被牵连，有些像拉迪亚德这样的人，原是最富自尊心最讲道德的，现在却不肯挺身而出奋斗，或要经过许久时间才偶露一面。即使露

面也只肯抗议，而不肯采取行动。其余不甚诚实的人，如圣约翰等，或更为坚忍和有胆略的如皮姆等，或只是专顾他们自己的个人安全，要同新党妥协，言归于好，否则至少也不愿同新党失和，因为他们已认定新党将要很快地独揽大权。许多腐化堕落的人已经放弃一切爱国的希望。这些人心目中只有自己的名利富贵，在管理事务的委员会中，他们形成一个贪污集团，专以分配官职、征用物品，互相勾结，坐地分肥为事。过去参与过这次民族斗争事业的贵族中，前文已经说过，有人已经背离了，他们前往牛津向国王讨好。其余的贵族们则归隐于他们的乡下住宅，不问国事了，以免再受蹂躏，再遭没收财产，他们轮流同议会或同宫廷谈判条款。9月22日，上议院只剩下十个贵族，到了10月5日，只剩五个了。于是每次开会都要点名，有几个人惟恐有人晓得他们不曾出席，又只好回到威斯敏斯特。但是较为高级的贵族，日益被人民大众怀疑，而且日益脱离人民大众，不独不再是长老会的支持者，而且成为他们的障碍了。他们的信教狂热使有才能的保护民权的人同他们脱离关系。而他们的温和的政治观点，却使他们摆脱不开不甚可靠的以及将会危害他们的同盟们。

况且这一派地位上升已有三年了，无论它在教会中或在政府中是否完成其计划，但是在这三年里头的公共事务都是由于得到他们的助力和同意才得以进行。只此一端，便足以使许多人讨厌这一派。人民就将所受的许多痛苦，及所遭遇的许多失望，都归咎于这一派。人民谴责他们，说他们惯好压迫人，不亚于主教们，说他们习于专横，又不亚于国王。一追忆到该派的自相矛盾，及该派的脆弱无能，就令人痛恨不已。而且姑且不问这种种不满人意的情况，又姑且不问党见及偏私，单从事态与意见的进展来说，人们暗地里都觉得需要有新的原则和新的统治者。

两派都准备就绪，力图争夺指挥大权，现在只在等待时机。早在这许多纠纷开始以前，长老会派还只是刚刚流露它的意向，

企图强迫国教会采用一种共和制，并且利用那种形式来保持权力和信仰的运用，以与主教制争夺继承天主教的遗业，独立派、布朗派以及再浸礼派，即已公开质问，为什么让国教会存在下去？无论是天主教士还是主教派，或者长老会派，它们究竟有什么权利可以自封为有压制基督教徒的信仰，使其受一种虚伪统一的束缚？它们说，凡是信徒在一块聚会，凡是同一地方或邻近地带几个地方的居民，因为信仰相同而自由集会来赞美上帝，他们就是一个真正教会，任何别的教会都没有统治这个教会的合法权威。这个教会自己有权选择牧师，有权规定自己的礼拜仪式，有权用自己的法律管理自己。良心自由的原则（这是地位微贱的新教徒在盲目热情的错误行动中对人宣布的）刚一出现，就被人们看做是犯罪或疯狂。主张这种原则的人好像并不十分了解这个原则，就竭力拥护它。主教派与长老会派，牧师们和地方官都一齐要求严禁这个原则，他们之所以要反对，并无多少理由，不过认为有禁止的需要而已。应该怎样管理基督的教会，以及归谁管理，这两个问题几乎一直是需要讨论的唯一问题。大家都认为，他们只需要在教皇的绝对权力与主教们的贵族制、长老会的民主制之间任择其一就可以了。却并没有人追究这几种体制的起源、它们的形式或名称是否合法。

但是这时有一个伟大运动在动摇全局，尽管从外表上看有些事物似乎未受其影响。每天都出现任何一种体制都不能避免受其影响的考验，每天都出现一些争论，即使当权的党派试图阻挠进行争论，也是徒劳。全国人民的心力每天都被召唤来考虑社会的新问题，来衡量意见，来驳斥前所未闻的大胆僭妄的主张，这些都使全国人民得到思想上的解放，并利用其新得的自由，飞跃到与人文和社会相关的更广大的思想领域去，或是立刻大胆地摆脱所有的古老成见，所有的清规戒律。与此同时，关于奉行信仰与礼拜方式的自由，几乎成了绝对的事；但现在还没有用司法权或

压制权来取代主教的大权。议会在忙于制服其仇敌，无暇过问它的党人在宗教方面脱离常轨的问题了。长老会派的热情有时叫两院发出带威胁性的宣言，以反对新的异派；有时政治改革者的恐惧及仇恨，与他们的奉教诚笃的盟友们的恐惧及仇恨合流，他们一同设法严厉地反对他们的共同对手。有一条法令的序文说明，它立意“禁止近来对宗教和政府名誉肆意毁谤的报纸、书本、小册子”。这条法令严禁出版自由，而在这以前是容许的。无论什么出版物都要先接受严格的检查（这是 1643 年 6 月 11 日的事）。但是权力不能阻止那些走在运动前面的人（运动自身被权力推向前进）。几个礼拜之后，只有保王党及主教派受到这条禁令的限制。反之，新教派对此不是设法规避，就是置之不理，于是布满全国的都是数目日多、门类更繁、狂热更高涨的新的教派，例如独立派、布朗派、反浸礼派、反童年洗礼派、贵格派、唯信仰论派、基督的王国派^①等。在长老会居支配地位的情况下，这次革命同时唤起了许多狂热教徒、哲学家和自由思想家来反对长老会派。

从此以后，全部问题面目一新，社会的动乱改变了它的性质。势力一向强大、素来受人尊敬的传统，过去曾经指导并限制政治改革家及宗教改革家的观点；对于政治改革家而言，这些传统就是古代英格兰的法律，至少是他们所设想的古代法律；对于宗教改革家而言，这些传统就是教会的组织方式，有如实行于苏格兰、荷兰和日内瓦的一样。这些古代制度既是一种典范又是一种约束。无论他们的事业是多么冒险，双方都不曾让步于空泛的愿望，也不曾让步于无限的要求。他们的计划并不是一切革新；他们的希望也并不是出于猜度。如果说他们在行动的趋向上有误

① 基督的王国一词出自《圣经·旧约》，意即“上帝的国必存到永远”。基督的王国派是狂热的盼望基督第二次降临的基督教徒。——译者

解的话，他们至少是能够指出行动的目标的，而他们的劲敌却没有一定的目标来作指导，又没有历史的或法律的传统来限制他们的思想。他们自信有力量，以为自己有高尚的理想、神圣的品格和大无畏精神而自豪。他们赋予革命以决定的权利，以管理一切事物的权利，且以革命作为他们的唯一指导。在革命指导下，哲学家们不惜任何代价追求真理，狂热的教徒不惜任何代价寻求上帝，自由思想家不惜任何代价追求成功。于是调动制度、法律、习惯、事件等等，按照人的理性或人的意志来控制革命。一切都变作新的联合的项目，变作有学问的创造。

在这样的大胆的事业里头，一切都是合法的，不管是根据于对一个原则的信仰，或出于一种宗教的狂热，或以需要的名义行事。长老会派现在在教会里头严禁君主制与贵族制，那么为什么在国家体制里还保留君主制与贵族制呢？政治改革家们曾透露出他们的意见说，到了山穷水尽的时候，如果国王或贵族坚决地拒绝同意一个于民有利的议决案，众议员们就应该运用其自身的权威，强行通过它。众议员们既有这样的意向，那么为什么不明明白白地公开地说出来呢？为什么一定要等到事机紧迫以及抗拒为法律所许的时候，才请出民权来，其实早就应该以民权为合法的权力，且应该作为政权本身的基础了。国人摆脱天主教教士们的束缚和主教制教士们的束缚之后，国家难保不会有受长老会教士箝制的危险。这对教士们究竟有什么好处呢？教士们依靠什么权利才可以形成一个永久性的、阔绰的、独立的集团？他们依靠什么才可以有权要求地方官相助？如今试从他们手中收回全部司法之权，甚至收回贬逐教徒出教之权，只给他们留下可以影响人的劝导、讲经、教训、祈祷的职能，那么所有一切滥用宗教权威，所有令宗教与政治格格不入的困难，当然会立刻停止。再有一点，关于信仰等问题的合法权力，本来是属于信徒而不属于教士；选择及委派牧师的权力，本来是属于信徒们的；牧师们并无

互相选派之权，选定之后亦无权迫使信徒们承认。不独这样，一个基督信徒本来就是一个牧师，就是他自己的牧师，就是他家庭的牧师，就是所有被他的语言所感动的人的牧师，这些人会因此而承认他是受感于天的，愿意和他一同祈祷上帝。上帝有权喜欢赐谁的福就向谁赐福，喜欢怎样赐，就怎样赐，有谁敢同上帝争呀？无论是讲经抑或是斗争，唯有上帝才能选择并赐封他的圣徒，等到上帝已经选定了，他就将他的事业付托与他们，而且单向他们启示应该用什么方法才能使上帝的事业得到胜利。自由思想家们听了这番话大喝其彩。对于他们来说，不管用什么方法，亦不管出于什么动机，都要实行革命。

于是独立派兴起了，他们比长老会派的人数少得多，在英国土地上的根基也没有长老会那么深固，但他们却已有了蒸蒸日上的势头，这都是从一种系统的和具体的事业目标来的，是由于在任何时候都不隐瞒自己的主张，也由于它胆敢毫不退缩地承担一切后果。英格兰此时正处于一个光荣的而又令人畏惧的危机之中，在此时际，人们忘记了自己的脆弱而只记得自己的尊严；既有只服从纯粹真理而不服从其他的雄心壮志，又有认定只有自己的意见才有权代表真理的那种不可理喻的自豪感。无论是政客抑或是信奉异派的信徒，亦无论是长老会派抑或是独立派，没有一派敢于认为本派用不着表明自己是有一权利的，也没有一派敢于承认自己没有能力证明自己是有一权利的。长老会派却经受不起这样的考验，因为他们的智慧是建立在传统和法律的权威的基础上的，而不是根据于原则的，因此他们不善于用专靠讲原则讲道理的方法来驳倒他们的劲敌的论据。只有独立派一家端出一条简单的主义（或原则）来，这个主义的形式是严格的，这个主义认可了他们的全部行动，足供他们在所处地位中的全部需要；它也使有毅力的人不致陷入自相矛盾，并使诚实的人不致假冒为善。只有他们一派开始发出一些强有力的号召，无论听者懂与不懂，它

们都以最崇高的希望的名义，在人们心中唤起了昂扬的热情。这些号召是：权利平等，公道地分配社会财富，取消全部弊端。在他们的政治体制与宗教体制之间并无矛盾，在一般成员与领袖之间又没有秘密斗争，既无排他性的信条，又无严格的考验使人们难以加入该派。他们与他们的教派一样（他们也因这个教派而得名），以信教自由为一条基本大法，由于他们所建议的改革是那么规模巨大，他们的计划是那么广泛而尚待确定，就容许许多目的歧异的人投到他们的旗帜下来：律师们加入他们的团体，希望从他们的对手即教士们手中夺去全部司法权及管辖权；酷爱自由的立法家正在考虑在他们的帮助下制成一部新的、明晰的、简单的立法计划，以便从律师们手中夺去他们的巨大利润和过大的权力。哈林顿可以梦想在他们之中有一群圣人；西德尼可以梦想斯巴达的自由或罗马的自由，利尔伯恩可以梦想古代萨克森法律的恢复；哈利森可以梦想基督再来到世上，甚至那不讲原则的亨利·马丁和彼得·温特沃斯，也由于考虑到他们的大胆而受到人们的容忍；无论是共和派或是阶级平等派，无论是推理派或是理想派，无论是信仰狂徒或是有大志的人，都在兼收并容之列，并把这些人的愤怒，这些人的学说，这些人的想入非非的幻梦，这些人的阴谋诡计，通通积聚起来变成一个集体；只要同对保王党和长老会派怀有深仇大恨的各群人物能抱着同样的热切心情，一齐冲向那情况不明的未来，这就足够了。

尽管埃塞克斯和他的朋友在战场上和在威斯敏斯特的大厅上打了胜仗，但却不能平息更不能长时期地压制这些内部斗争，这在牛津或伦敦早已成为众所周知的事了。所有明智的人，无论是议会派抑或是保王党，都利用党争做他们联合的基础。国王从各方面得到关于这方面的消息，左右也力劝他利用这些分歧。无论是宫内大臣抑或是内阁大臣，无论是阴谋家抑或是真诚的朋友，各有各的私人情报来源，各有各的建议或办法。有人劝告应该不

间断地把仗打下去，认为互相冲突的各派不久必定会只顾私斗，不顾公敌；也有人反对这个主意，他们劝国王不如叫在牛津躲避的贵族，特别是霍兰伯爵及贝德福德伯爵，出来调停，应该同埃塞克斯和他那一派谈判条件，因为他们那一派事实上从来没有放弃谈和。甚至有人提议，莫如试探一下先同独立派的领袖们谈判条件，因为同他们谈和，能够得到较好条件。洛夫莱斯勋爵已得到国王的许可，同哈里·文爵士很亲密地通消息，而他根本不知道哈里·文却是奉了他自己一派的训令来摸宫廷的底。但是国王并未采用这些建议。事实上，那些背离了议会的贵族，即使求见牛津要人一面，也要费很大气力。这些要人一听见贵族来到，就大声表示对他们的愤怒。内阁郑重开会，详细地讨论应该怎样接待他们，虽然海德提过较为谨慎的办法（他新近奉派为财政大臣）。查理一面允许接见他们，但却决定要冷冷地相待。霍兰伯爵是一个最利落最精明的廷臣，他在杰明的帮助下，设法重得王后的欢心，却无效果。他用尽他的巧妙手段要恢复从前与国王亲密的地位，有时他装作和国王附耳低声说话，有时借词引国王到窗口说话，以便有机会示人以他能够同君主说私房话，但也是枉然。在纽伯里之役作战的时候，尽管他曾经自告奋勇，亲临前线，勇敢打仗，以他的血作誓言，作为重新效忠于国王的证据，但是，傲慢而沉默的国王却丝毫不为所动。宫廷对霍兰伯爵也是啧有烦言。这两个来牛津躲避的伯爵，看到宫廷执意不肯要他们效劳，现在唯有考虑怎样以最好方式脱离这种难堪的处境了。向国王建议努力打仗当然更为动听，但也无大结果。围攻格洛斯特的失败使得牛津陷入萎靡不振的无政府状态和公然结党营私；彼此以这次的致命失败互相责难，内阁对于陆军的无纪律颇有微词，陆军却很无礼地责骂内阁；鲁珀特亲王虽然在打仗时可以堂而皇之地不听除国王外任何人的号令，却很妒忌统帅，统帅与重要的贵族也口出怨言，大叫大喊地反对鲁珀特亲王的独立行事与

下贱粗鄙。国王很尊重自己亲人的尊荣，因此也尊重他的外甥鲁珀特亲王，他下不了决心去责备自己的骨肉，而优待一个区区臣下；他宁肯这样荒谬可笑地维持王族体面，而不惜牺牲掉他的最有用的朋友们的权利甚至效劳。只有海德一个人曾经直率地尝试改正他的国王的错误，有时也有成功，但是海德在宫廷毕竟是一个新进，他并无职守以外的名望和权力，还不时需要国王助他一臂之力以抵制王后的脾气，或抵制有妒忌心的廷臣们的阴谋。他尚能维持作为一个有势力的枢密顾问官及一个明智之士的声誉，但并不处于任何真正的优越地位，亦不能获得任何重要的结果。简单地说吧，牛津与伦敦，同样地存在内部不和，但牛津的不和更能产生致命伤，因为在伦敦的不和推动事态的往前进展，而牛津的不和则反使事态更进一步陷入瘫痪。查理就是在这种一切都滞碍难行的情况下，在他内心深处厌倦他自己的那一班人马，如同他厌倦他自己的人民一样的时候，他才得知议会与苏格兰已结成新联盟，这样就又有一个王国准备同他打仗了。他于是命令汉密尔顿公爵（他重新得到国王的信任）做驻扎苏格兰京都爱丁堡的委员，准备不惜任何代价，都要阻止这两者的联盟。据说公爵奉命向苏格兰建议，将来内廷的官职，将以三分之一派给苏格兰人，从前原属于苏格兰的诺森伯兰、威斯特摩兰及坎伯兰各郡又交给苏格兰，国王答应定居于纽卡斯尔，而威尔斯亲王及其王廷则驻在苏格兰。即使国王真的答应过这几条，那也显然不是出于真心，而且显然也是办不到的。即使苏格兰议会倾向于不把它当做国王的欺骗手段，新近出的一桩事件也使这样一种欺骗成为根本不可能。安特里姆伯爵新近在爱尔兰被驻扎在北爱尔兰的苏格兰军队拘捕（那时他刚从船上登岸之后不过几个小时），在他身上搜出一个计划的几项证据。这个计划是他和蒙特罗斯二人同王后住在约克时所定的，预定要装运很多爱尔兰天主教徒进入苏格兰，又在北方招募高原的人，这就能够很有力地分了敌人的兵

力，以利于国王。这个计划显然即将实行，因为蒙特罗斯是在围攻格洛斯特的时候回到国王这里的，而安特里姆则是刚从牛津来此。国王这个时候与他上一次前往苏格兰一样，正在计划最黑暗的计谋，以反对他的人民，同时，他正在对人民提出最动听的建议。在苏格兰京都的议会同在伦敦威斯敏斯特的议会订好了条约，并将这些详情通报伦敦。

这时它又将所打听到的一件更重要的事的详情告知议会。安特里姆伯爵的文件，显然暴露了国王同爱尔兰叛党保持经常通信，揭露他有好几次接受他们的建议以及他们的贡献。他甚至正在同叛党订立停战条款，他希望从这样的安排中，在下次交战中会得到最有利的结果。下列情况是完全真实的：当查理同英格兰对话的时候，总是对爱尔兰痛加咒骂，但他早已和爱尔兰谈判了很久的时间。叛乱所点燃的战火，已经在这个不幸的地方接连发生，但是没有达到目的。士兵共有一万名或一万二千名，饷既不厚，也很少有轮休的机会，平乱是大大不够的，但是却够阻止人民得到解放。1642年2月，在内战未起之前，议会期望付出一番大力平乱，于是借了一笔款项以供一场决定性的征伐之用。至于叛党的财产，反正早晚是要充公的，最后免不了要变作国王的财产，于是用预先征收的办法，依照一定比例以便偿还借款。果然凑成了一大笔款，并送若干赠款给爱尔兰，不料内战爆发，议会自顾不暇，极少想到爱尔兰。即使想到，也不积极，更无成果，只能在该地的基督教徒闹得厉害的时候，对他们的怨言说几句安抚的话，而最要紧的还是要爱尔兰晓得，所有一切祸害都要国王负责。查理对于爱尔兰人民的利益很少注意，亦很少为爱尔兰的基督教徒作出牺牲。他责备议会不该动用一部分为安抚爱尔兰人民而抽收的款项，但同时他却截留解往爱尔兰的粮食，又从都柏林的军火库里头取走了爱尔兰本身所急需的枪炮及子弹。但是爱尔兰的重要基督教徒是贵族，都亲附主教制及王室，陆军的军官

们中有很多人是保王党，是议会急于驱逐的，他们的将军奥蒙德伯爵，有钱有勇，慷慨大方，又是人民所爱戴的。他打胜叛党两次，但将胜利完全归功于国王。爱尔兰的议会党衰落得很快；亲附议会党的地方官全被保王党换了，议会曾派两个下议员前往爱尔兰当委员，要恢复已失的势力；可是奥蒙德不许他们入市政会。到了第四个月底，他觉得势力充足了，竟逼这两个议员回英国（2月）。从这个时候起，所有军政民政的大权都集中在国王手中。现在国王已摆脱了麻烦的却是无效的监察，就不复迟疑不决了，他就放手进行他的意向及他的困难促使他要进行的计谋。王后本已按期同爱尔兰的天主教徒通信，对此查理无疑是知晓的。现在，爱尔兰的叛乱不像它初起的时候那样，仅仅表现出一群野蛮的暴民的狂怒的迸发和可怕的过火行动了。自从1642年11月14日以来，在基尔肯尼设立了一个操统治大权的二十四人的议会，审慎地井井有条地管理乱党，对国王已不止一次地表示服从与亲密，力劝他不要再与他的只愿效力于他的忠诚人民为难，以使他的仇敌快意。这个时候，查理还不认为他自己已处于很危险的境地，亦不能完全置和缓英格兰舆论的需要于不顾，所以尚不能公开同爱尔兰叛党联盟，但是他认为，他至少可以向爱尔兰表示一些好意，把用他的名义同爱尔兰打仗的军队撤回英国，转用来攻打更恶劣以及更可怕的反叛。奥蒙德奉命按照这个意思同基尔肯尼的议会进行磋商，与此同时，为了讲出一个理由，或者至少提供有个借口，于是不谈别的而只谈基督教的事业及其捍卫者在爱尔兰所处的困境（事实上也不假）。军队写了一篇长而悱恻动人的抗议，向都柏林的大堡陈诉，历数军人的疾苦，宣布他们决心不愿再当军人，因为他们已无法克尽厥职。同时将这样的备忘录送交牛津与伦敦，要国王及议会都晓得他们的痛苦。谈判正在进行；当安特里姆被逮捕的时候，正要达成协议。快到9月底的时候，也就是议会在威斯敏斯特郑重地接受它